

应对措施也更为细致，包括改善病人食物营养、停止测验和体育课、制定传播扩散应对预案、澄清谣言等，并再次要求在校师生重视疫情，“尽量不与外人多接触，也不邀请外人来校游玩或留宿”。可见，当时疫情处于学校整体掌控之下，教学秩序基本正常，仅测验项目停止，也没有关闭学校和外部的人员交流。

控制疫情的全部压力，集中到学校保健科上。据邢醒回忆，当时保健科一共有19人，分别为科长李伟民，医生沈翠梅、吴荣山、宋捷林、韩辛尹、郑葆堤、邹致仰、吕萍，护士唐怀芬、惠锦棣、王芝芳、王奉荣、焦蟠蒂，药房吴映雪、周新蕻、邱瑾，挂号张松福、管理人员邱福祥、化验室邢醒，其中7人以登辉堂隔离病室工作为主，因人手不足，学校事务科孙承烈、杨银春2人支援登辉堂，承担勤杂工作。其余则留守保健科维持多达三千人次的诊疗。工友3人，分别为范寿全、时兆荣、“丁妈妈”。另有食堂师傅负责餐食。

保健科李伟民科长虽未出现在1957年的照片上，但他无疑是疫情期间的一线指挥。当时住在隔离病室的学生杨翱卿写到，“有限的白衣战士，不仅要进行比平常忙乱的门诊，隔离病房还要昼夜值班，星期天也毫不例外。保健科李伟民科长像慈父般站在你的身旁，沈医生（沈翠梅）像慈母般走遍每一个病人的身边。”从同期校刊中可以看到，为了应对疫情，李科长花了不少心思，“保健科采取了‘一切服从防治流行性感冒’的特别措施，门诊时间放长，任何时间都可以为病人诊疗，每天都有人通宵值班。为了克服病人多、医务人员不够的

困难，市公费医疗办公室也抽调出二位医师来我校支援。”作为为数不多的男士，李科长还自己动手“在休息的时间，亲自为同学搬运床铺、棕绷”。

幸运的是，流感虽来势凶猛，但并未在复旦肆虐多久。记录中的受访者在登辉堂隔离一周左右均已康复。病情从3月底兴起，到4月13日预计已现峰值，随之迅速消散。到4月27日的校刊中，疫情已悄然无声。4月26日《解放日报》曾报道《本市流行性感冒患者日少》“急诊及门诊病人已接近平日数量……流行性感冒病人已占极少数。因流行性感冒而影响生产、学习的工厂、学校也已恢复正常状况。”据邢醒回忆，登辉堂“方舱医院”运行时间应在半月以上，但未满月，两者可互为印证。在当时火热的革命背景中，在全校紧急动员抗疫下，疫情更像是一段嘈杂的噪音，学校的发展很快调回了主旋律上。

温情：疫情中的复旦日记

疫情来势汹汹，卷入漩涡中的学生心情亦是大落大起、翻江倒海。57级新闻系徐成森两年都不幸染病，其中1957年的日记详细记述了自己病情起伏的经历：

三月二十七，到合作社买了个口罩，以防最近流行的感冒与脑炎。

三月二十九日：流行性感冒来了，我真怕我会生病。下午发热，怕是感冒了。……我得小心，很小心。……寝室里，万忠实已经染上了，他就睡在我下铺。

三月三十日：然而终于还是病

倒了。上午全身酸倦……送到了隔离病室，后来温度升至39℃。病是痛苦的，可是护士和行政给我们照顾得很好，我得感谢他们。

三月三十一日：今天温度退了些。有个姓王的护士与我很亲近，老叫我“小孩儿”。晚上突然烧到40℃，烧得实在受不了。那时突然想到死。不！我年轻，还是“小孩儿”呢。

四月一日（二日补记）：昨夜如梦幻一般过去了，今晨醒来，头昏昏，身体酸痛而且无力。嘴巴也发苦了，什么也不想吃。病，真是痛苦。

四月二日：今天体温逐渐下降了。下午已经是36.8℃了。

四月三日：明天我要出院，大王来问我：“你要走了吗？”声音中像有惜意。

徐成森日记中的“大王”是王奉荣护士。当时，保健科上上下下都以病中师生为重，为苦难中的“小孩儿”们送去抚慰。

新四班耕灵在《隔离病室》一文中写到：“深夜，……当被那痛苦催醒而呻吟时，白衣大夫早已静停在我身边，替我注射‘百乃定’，给我吞服‘氯霉素’，使我减轻了

右图：徐成森《我的复旦四年》中记录了1956年和1957年流感经历。

